

# 余英时论胡适

李晶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长春 136000)

[摘要]余英时是当代著名文化思想史家,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通过研究余英时对于胡适的评论,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余英时的学术思想。余英时在胡适研究中不仅延续了其一贯的“内在理路”分析法,还运用了多元文化史观分析“五四运动”,运用反证法给胡适的博士学位疑案做了“最终判决”,表现出其史学研究方法和文化观的多元性。

[关键词]余英时;胡适;内在理路;多元文化史观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13.02.017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13)02-0054-04

余英时是当代著名的文化思想史家,“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sup>[1](P161)]</sup>,所以胡适自然是余英时研究的对象之一。但是,初读余英时写胡适的作品,读者大致会有这样一个印象:余英时对于胡适的研究相当大的篇幅是为他人著作作的序。的确如此,在笔者搜集到的余英时研究胡适的9篇文章中,有三篇是序文,并且包含篇幅最长的两篇——《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为《胡适日记全集》序)、《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但是,这并不妨碍余英时的胡适研究的思想性。

余英时对于适之先生的个人情感也是很深厚的,这种情感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青年时期读胡适著作对其治学方向产生很大影响。余英时在《我所承受的“五四”遗产》一文中说他在北平读书期间读了胡适的著作,并且说“胡适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在梁启超之上。我因此了解到:如果我要真正了解中国的传统,必须同时要西方传统和现代世界有深入的体认”<sup>[3](P73)]</sup>。第二,是其恩师杨联升对胡适的深切感情对其造成的影响。余英时曾经这样描述杨、胡二人的交情:“杨和胡的交情则更比其他青年学人为深厚。这不仅因为两人性格都温厚开朗,特别投缘,而且知识上的兴味也最为接近。他们都喜欢历史考据,都好研究中文的文法和语法,尤其是都爱写诗。这些共同兴趣很早便使他们两人的交情进入了不拘形迹的境地。”<sup>[1](P148)]</sup>但是,杨联升和胡适的关系不止于诗歌的唱和或私交方面,更重要的是二十年间没有中断的论学往复,可以说,杨联升受到胡适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不难推断,杨联升在与余英时论学时,或多或少都会提及胡适的治学精神与学术思想。而余英时也的确对胡适有一些研究,现已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和《重寻胡适历程》两本专著和一些论文。

学界对于余英时的胡适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类:第一,图书介绍。风石堰的《自由与容忍之间的胡

适》<sup>[6]</sup>一文主要介绍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这本专著怎样还原了真实的胡适,引起读者阅读兴趣。钱婉约写的《思想史研究的理性分析》<sup>[5]</sup>这篇文章是对于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的内容提要;第二,对于余英时的胡适研究的某一部分发表见解。李国涛在《重寻历史的真相》<sup>[7]</sup>中提出了自己的三点感悟:对余英时描写的胡适出任美国大使一事表示钦慕;对余英时论述的胡适的自由主义身份的认同;对余英时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文中运用历史的方法阐释五四运动的做法进行褒奖。李正春在《余英时的胡适观》<sup>[8]</sup>中赞扬余英时用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分析胡适,突出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并且认为余英时的《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文发掘出了胡适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当代意义。郭铁成的《“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sup>[9]</sup>一文是借余英时的《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这篇文章廓清“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两个概念,指出余英时把吴宓、梅光迪、陈寅恪、王国维放入“新文化”之中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应放入“新文化运动”之中。现代许多人将这两个概念混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余英时的胡适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其中也不乏深刻的分析与评论,但不足之处在于对余英时在胡适研究中是否继承其一贯的“内在理路”研究方法以及如何实践其多元文化史观和反证法缺乏深入探究。笔者根据已搜集到的材料,希冀对余英时的胡适研究做出新的解读。

## 一、从学术的内在理路分析胡适的思想及其建立的新史学范式

余英时赞同学术界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评价,也认为它建立了“史学革命”的“典范”,他自己曾经这样评价胡适建立的“典范”的革命性作用:“如果我们承认现代史学曾经经历革命过程的

话，那么事实上它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史或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开始的，而胡适先生在此则恰好扮演着一个革命性的角色”<sup>[2](P364)</sup>。余英时总结《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革命性意义有两方面：第一是它本身在内容上是属于中国的，可是形式和概念上却是取自西方的，这个典范一直到后来也都未曾被推翻；第二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关于《墨经》逻辑的部分是他研究上有所突破之处。

但是，余英时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指出，这个“典范”的建立是和考证学的内在发展相应的。蔡元培将胡适建立的典范作用归结为四点：“一、证明的方法，包括考订时代、辨别真伪和揭出各家方法论的立场。二、扼要的手段，也就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三、平等的眼光，对儒、墨、孟、荀一律以平等眼光看待。四、系统的研究，即排比时代，以见思想演进的脉络”<sup>[1](P221)</sup>。余英时说“这四点当然都受了西方哲学史的影响，但是同时也和考证学的内在发展相应”<sup>[1](P221)</sup>。例如，关于第二点“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表现出来的这种“疑古”精神在顾颉刚、康有为的时代已经出现，“是考证学的内在理路逼出来的，不是胡适异想天开地从国外搬回来的”<sup>[1](P222)</sup>。余英时还说，关于蔡《序》中的第三点，所谓“平等的眼光”，也同样是从考证学的内在发展过程中逐步透出来的。余英时说至少自戴震以来，考证学已开始显露种种内在的“危机”。这种危机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技术崩溃”，也就是不符合“典范”的期待的变异现象不断的出现，新发现的文献证据不但不再能支持原有的基本假定，反而动摇了这个假定。通过余英时的分析，我们知道，20世纪所谓的新思想不完全是外来产物，其中一些思想因子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可以找到其渊源的。但是，余英时并没有完全否定胡适的创建作用，而是客观的讲，胡适的新考证学中的个别观点虽然大概都可以在清代考证学传统中找到根源，其中有些比较现代的成分则或许来自康有为、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启发，或者得之于西方学术的训练。从这一方面看，他确是承旧过于创新。但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并不是个别的观点，而是一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全新的“典范”。所以，“‘截断众流’和‘平等的眼光’之所以要等到《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现才发生‘革命性’的影响，正是由于它们已不再是个别的、孤立的观点，而成为‘新典范’的有机组成部分了”<sup>[1](P230)</sup>。余英时又接着说“我们已看到清代考证学自乾、道以来便面临种种技术崩溃的内在危机，‘旧典范’虽屡经修正而终不能容纳愈来愈多的‘变异’。经过这一长期的发展。最后才有‘新典范’的脱囊

而出。这个‘新典范’之所以在胡适手中完成，正因为他是从考证学传统中出身的人。这绝不仅仅是他从杜威那里学到了实验主义方法论便能办得到的”<sup>[1](P230-231)</sup>。在这里，余英时从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溯源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轨迹，也肯定了胡适的功绩。

余英时除了用内在理路的方法来考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建立的史学新典范，同时也用来考察胡适的学术思想。余英时认为胡适的“怀疑”精神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不仅仅是杜威实验主义的产物，而是在之前的考据学训练时已经打下基础。作者说，虽然根据胡适自己的供证，他的思想基本上便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前者（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后者（杜威）教他把一切学说都作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和思想的结果。总之，这两个人使他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sup>[1](P192)</sup>。但是余英时认为，胡适在正式归宗于杜威的实验主义之前，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倾向。这时他还没有研究杜威的思想，但他精神上已十分接近杜威的实验主义了。在他的心目中，实验主义的基本意义仅在其方法论的一面，而不在其是一种“学说”或“哲理”。“他是通过中国的背景，特别是他自己在考证学方面的训练，去接近杜威的思想的。从这个背景出发，他看到实验主义中的‘历史的方法’及其‘假设’和‘求证’的一套运作程序，一方面和考证学的方法同属一类，但另一方面又比考证学高出一个层次，因此可以扩大到应用于解决一切具体的社会问题。他深信这便是科学方法的最新和最高的形式”<sup>[1](P197)</sup>。余英时认为，胡适在方法论的层次上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中国考证学的传统汇合了起来，是他的思想能够发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

## 二、用反证法对于胡适博士学位的疑案做出“最终判决”

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一文中，余英时对胡适博士学位问题做出了初审，认为“总之，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除了因‘论文缓缴’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至少到现在为止，尚未出现任何足以致疑的证据，唐得刚先生‘论文口试’为‘大修通过’之说，仍然是一个‘假设’”<sup>[1](P12)</sup>。但是，作者说，“我觉得如果不能提出积极的反证，仍不免有人会坚持说：这是‘事出有因’，不过‘查无实据’而已”<sup>[2](P361)</sup>。

余英时认为只有找出证据证明以下两点，才能彻底解决胡适博士学位问题的疑案，“第一是能证明1922年出版的《先秦名学史》即是1917年5月4日

交到哥大哲学系的论文原本;第二是能证明1917年5月22日参加口试的六位教授,特别是指导教授杜威,对于论文曾有过肯定的表示”<sup>[2](P361-362)</sup>。这两点系反证,只要找出其中一点,就可以让胡适“老胡冒充博士”的谣言烟消云散。而作者在《胡适全集》中意外的将这两点反证的证据全部找到,将搁置了85年的“胡适博士案”彻底解决。

同时,余英时解释了为什么出现有人诬陷胡适冒充博士的现象。1917年胡适提倡白话文学而“暴得大名”,“一夜之间他便成为众矢之的,也就是他所谓‘箭垛式’的人物。他在思想史上和政治上的敌人是数不清的,个个都想看他出乖露丑。‘冒充博士’、‘口试没有通过’当然是他‘出洋相’之最大者。这一流言既起,‘批胡’的人便一拥而上,源源不断,再也不用问其事是虚是实了”<sup>[2](P360)</sup>。余英时在看到一种历史现象时,往往会追根溯源,找出事件发生的原因,这也体现了他对待问题的历史主义的态度。

那么,余英时研究胡适又是抱着怎样的心态呢?笔者认为余英时研究胡适博士学位问题大致是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我对于他的思想探究完全出于‘毁’、‘誉’以外的历史兴趣,唯一的指导原则是尽可能客观地恢复它的‘本来面目’”<sup>[2](P360)</sup>。第二,“胡适生前常常以‘考据癖’自喜,我也忍不住‘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试一试‘考据’,究竟能不能解决这一长期未决的悬案”<sup>[2](P360)</sup>。

但是,问题并不像余英时想象的那么简单,笔者发现现在的胡适传记依然将“胡适大修未通过”作为事实来记述。在一篇《江勇振:破解胡适之谜》的采访稿中,江勇振对于“胡适博士学位”问题,指出:“胡适当年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主要是因为《先秦名学史》根本不符合杜威实验主义精神,这本论文无法过杜威这一关。”<sup>[10]</sup>江勇振是哈佛大学博士,这段话是宣传《舍我其谁:胡适》这部作品时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出的。《舍我其谁:胡适》被称为胡适传记最权威的版本,于2011年出版其第一部。按照年代来看,他这部作品在余英时的《胡适“博士学位”案的最后判决》(创作于2004年)之后,不知是余先生的文章影响面不及,还是说服力不强,姜先生未采纳余英时的说法,个中原因值得进一步考证。

### 三、用文化多元主义的观点评价胡适眼中的“中国的文艺复兴”

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问题,曾经不断有学人提出看法,有学者将它界定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有学

者将它界定为中国的启蒙运动。胡适是“文艺复兴说”的有力支持者,余英时说“在西方宣扬‘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理念,胡适比任何人都更为重要”<sup>[1](P243)</sup>。并且,“从1917年起,胡适始终坚持,五四运动作为一种思想或文化运动,必须被理解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sup>[1](P250)</sup>。

余英时还分析了胡适对五四运动有如此界定的原因:“这不仅因为他提倡以白话文作为现代文学的媒介,而且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对历史连续性有深刻的体认。对他而言,‘文艺复兴’暗示着革新,而非破坏中国的传统。尽管胡适经常有猛烈的批判,但他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的抗拒,远非全面的。他深信,文艺复兴含有一个中心观念,即有可能把新生命吹进中国的古文明”<sup>[1](P250-251)</sup>。在这里,余英时解释说,胡适认为将五四界定为代表着革命与创新的文艺复兴,对于已经黯然的中国古文明有唤醒之功效。也就是说,胡适将五四界定为文艺复兴,主要是出于一种对中国古文明的规划。

但是,余英时并不同意胡适将五四界定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论说。他认为胡适的做法是将西方的历史概念套用在中国具体历史当中,是不科学的。余英时说:“我提议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完全抛弃比附”<sup>[1](P257)</sup>。所以,余英时修正了胡适的观点,认为要承认五四首先是一种文化外借,“关于李长之对五四的重新评价,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他公开承认,五四作为一种文化运动,首先必须理解为一种文化外借运动;或者用其他的话说,一种移植西方文化到中国的运动,然而并没有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sup>[1](P256-257)</sup>。

在这种外借的文化面前,有支持或反对的各类的文化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余英时在这里又借用了胡适对于新思潮的定义,将五四界定为一个含有多重面向与方向的文化时代。余英时解释说,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开宗明义的点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余英时说他想以此作为出发点,指出探究五四思想史的一种新方式。如果新思潮或新文化的中心意义是在批判精神指引之下研究中学与西学,而研究的目的又是使二者互相阐明以求最后获得一种创造性的综合,那么“新文化”或“新思潮”的概念便必须扩大到可以包括参加了五四运动的每一个活跃分子。可以说,余英时抛弃了胡适比附的做法,同时又采纳了胡适对于新思潮的定义。

余英时认为,当时批评五四的所谓“守旧派”,也和他们“进步的”对手一样,不但具有批判的精

神而且也采取了西化的立场，理所当然应该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对不同的人而言，五四始终是也仍旧是很多不同的事物。对我而言，根本上它是一个文化矛盾的年代，而矛盾则注定是多重面相的，也是多重方向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把它看作是一个单纯而又融贯的运动，导向某一预定的结局，好像受到一种历史的铁则的支配一样。在我看来，每一个五四知识分子都似乎是独特的，他们之中，很多人都随时在改变自己的想法，既快速又剧烈”<sup>[1](P267-268)]</sup>。所以，余英时认为，五四必须通过它的多重面相性和多重方向性来获得理解。并且，余英时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明确的表达过自己的历史观。他说：“首先，我绝不是一元论的。其次，我更不是定命论的；我无法相信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是由于某种单一因素的作用，自然我也无法承认历史发展是遵循着某种既定的公式。历史的因素极多，也极复杂”<sup>[4](P128)]</sup>。这显然是一种多元文化史观。总结说来，余英时是在批判与吸收胡适的观点之上运用“多元文化史观”对于“五四运动”的做出了一个重新界定。

以上可以看出，余英时从一个历史思想家的高度对胡适的思想与学术成就给予了深刻的定位，从中也反映出其作为一名史学家具有多元的史学思想和方法。除了研究胡适之外，余英时还对钱穆、陈寅恪、顾颉刚等多位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有深入的剖析。笔者在阅读了相关研究成果后发现，学术界对于余英时的明清思想史、史学方法与路向、文化观的探求不乏力作，但是对于其近现代的学术成果却鲜有关注。尤其是对于余英时对二十世纪中国史家的研究更是无人问津。本文希冀通过发掘余英时的胡适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径，开启学术界对

于余英时的近代学术成果的研究，加深对于文化思想史家余英时的思想的认识。

注释：

分别是：《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论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年谱学与现代传记的观念》、《胡适“博士学位”案的最后判决》、《学术思想史的创建及流变》。

参考文献：

- [1] 余英时. 重寻胡适历程[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 [2] 余英时. 现代学人与学术·余英时文集(第五卷)[A].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3] 余英时.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 [4] 余英时. 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余英时文集第六卷[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5] 钱婉约. 思想史研究的理性分析[J]. 中国图书评论，1989(1):63-66.
- [6] 风石堰. 自由与容忍之间的胡适[N]. 华文文学，2004-12-16(3).
- [7] 李国涛. 重寻历史真相[N]. 中华读书报，2005-03-23.
- [8] 李正春. 余英时的胡适观[J]. 鲁迅研究月刊，2007(8):62-63.
- [9] 郭铁成. “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J]. 粤海风，2011(1):3-6.
- [10] 张宏. 江勇振. 破解胡适之谜[N]. 中华读书报，2011-6-15(7).

[责任编辑 王云江]

## Yu Ying-shi's research on Hu Shi

LI Jing

(History and Culture Institut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6000, China)

**Abstract:** Yu Ying-shi is the famous minded historian now, Hu Shi is the central academic figure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By studying Yu Ying-shi's comment on Hu Shi, we can learn about Yu Ying-shi's academic thoughts in a different view. In Yu Ying-shi's research on Hu Shi, he not only continues his Inner Logic analysis, but also analyze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rough a multiple cultural view and makes a "final judgment" of the doubtful case about the Doctoral degree of Hu Shi by the manner of anti-citify. The diversity of Yu Ying-shi'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attitude of the history is expounded therefore.

**Key words:** Yu Ying-shi; Hu Shi; inner logic; multiple cultural view